

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演进分析

曹元^{1,2}

(1.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4; 2. 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的准确概括,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坚持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一个演进过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综合判断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着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更具体更细分的发展阶段,也就是立足生产力量变累积和立足生产关系部分质变发展阶段。只有脚踏实地地立足具体历史阶段,把握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主题才能真正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唯物史观;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8)06-0028-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此指导下提出了“三步走”战略并圆满完成前两步战略目标,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吸取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

一、如何正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广义上讲,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划分包括社会形态的划分;狭义上讲,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主要指同一社会形态下的发展程度的划分。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规律,一直是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科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把社会发展的动力从历史学中的传统观念和人物解释转到社会生产这一基本的普遍的社会实践活动上,使得社会形态的演进获得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和基础,奠定了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例如,马克思提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222}可见,生产力

尺度是社会形态划分的基本尺度,只有以生产力作为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的主要因素,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划分才有客观依据。

当然,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并不是由生产力这个唯一因素决定,生产力只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仅有生产力而没有社会生产的展开,并不能真正地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同样不可或缺。社会形态实际上是关于社会的整体结构与阶段性水平和特征的界定,是基于社会生产展现出来的社会存在的总体状态,包含整个社会关系在内。而需要把生产关系从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是因为生产关系直接关乎社会生产,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以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化来探讨和分析不同社会形态的性质变化,才能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推进唯物主义立场,从社会生产及其形成的关系中确定社会形态的划分。因此,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生产关系是社会形态划分的主要尺度。例如,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指出:“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有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

收稿日期:2018-03-10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8SJA0213);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立项课题(2018B11)

作者简介:曹元(1989—),女,江苏淮安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等研究。

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1]340}由此可见,各种社会形态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表现,每一种社会形态又是一个特殊阶段,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需要立足社会形态划分,更要独立把握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阶段,都需要从生产力变化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和进一步的社会关系变化及整个社会的变化把握。

根据马克思建立的对人类社会历史阶段划分的完整客观标准,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依次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当时苏联已经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五种社会形态。”^[2]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形态时,对其不同阶段和主要特征也形成了划分,从而呈现出社会发展完整的历史面貌。例如,马克思认为,社会形态不是抽象的,不是绝对的,而是包含着发展变化的,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发展阶段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现出丰富的内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3]可见,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也看成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其经历了工场手工业“劳动力为起点”的阶段,后来由于机器广泛使用而出现了更为典型的“劳动资料为起点”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段,最后又由资本传统自由竞争走向了垄断集中不断发展阶段。

就内核而言,社会形态反映的是在生产力发展的特定水平(能够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上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存在的一种状态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在一定的历史期限里有着较为相似的特征和稳定的因素(生产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质变化),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唯物史观的规律范畴,就其规定性本身来说,也是历史的范畴,它的适用性以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也就是说对历史阶段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长时段的一般性社会阶段划分,而是应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寻求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具体阶段性特征。”^[4]只有通过不同的生产力发展产生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与矛盾,才能清晰地认清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社会发展变化和社会阶段性主要矛盾,通过社会形态历史发展共同的基本矛盾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主要矛盾及其关系,才能真正地认识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发展动力机制,明白主要矛盾是

否变化实际上才是社会发展阶段性的一种体现和划分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使生产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阶段性特点和结构性的延续。就某一具体社会形态而言,生产关系既可以通过体制机制性因素即结构性因素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性保障和条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滞后性与自身的维护性,(不是彻底)不同程度和不同表现地影响或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展现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内容。但毫无疑问,生产关系结构性与发展的阶段性是认识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依据。社会主要矛盾往往能反映阶段性特点,是生产力发展阶段性与生产关系的适应性之间的矛盾的一种发展表现,是社会结构性调整和变化中的一种发展表现,也是制订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只有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界定主要矛盾,才能使决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科学化。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水平是出发点和基础,生产关系的程度是标准和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是阶段性特征发展的根本力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生产力发展的量变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性阶段过程,它的发展没有现成的方案可寻,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理论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立足社会基本矛盾,形成了立足生产力发展进行生产关系改革的量变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一个延续的、递进的过程,其开创和发展是在不断认识、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的实践中前进的,是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从理论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论述总体上还属于一种设想,并没有具体地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这种设想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分析和批判基础上,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和理论逻辑,但却不足以使它完全解决未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的具体问题。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这里只指出了社会发展的原因,指出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出来的终极原因,并

没有明确并具体地回答社会主义社会历史阶段和具体社会结构。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虽然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6],但这种社会发展历史阶段性思想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展开充分的阐述和分析,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性发展划分、阶段性主要特征和阶段性社会结构,并没有充分地说明。

从实践上看,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延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性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后来,列宁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划分为“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的社会主义”“完整的社会主义”。这种划分主要依据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划分主要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性的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力,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建立在马恩所构想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而是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区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并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成了当务之急,没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存在问题的认识。这样的划分,虽然立足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没有建构出生产关系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相互交融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认识是在上述基础上形成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重要结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虽然认识到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现状,但并没有深入研究和探讨生产力落后下生产关系的适应形态,没有充分说明生产力决定下生产关系演进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在具体实践中,片面地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关系变成了主要立足于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者之间,过分强调前者而相对忽视后者的决定作用,并且试图超越生产力实际水平提出超阶段超历史的发展目标,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生了曲折。这一历史教训说明,不能只把社会转变看成一个历史阶段性过程,而应当意识到,一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也可能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引起的社会结构演变和目标任务的变化。如果只看到根本性的质变发展,而看不到量变发展和部分质变发展,就会缺乏对现实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思考和分析。

从现实上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理论,并结合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

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中国社会客观实际出发就必然能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立足于生产力发展进行生产关系改革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阶段是真正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和规定的,辩证统一地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立足生产力实际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有问题的,是需要改革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会带来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因此,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社会实践展开这个历史阶段的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应有之义。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生产力发展通过改革开放进行生产关系改革实现量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7],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展开是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空前发展和变化。改革开放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整体较低,生产关系单一,社会缺乏相对灵活有效的发展机制,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根本动力。突出表现在不能完全正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客观实际和客观存在着的落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生产力不能真正达到量变的积累处于较低层次。改革开放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改革,使得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解放出生产力,生产力发展赢得空间和平台,走上真正量变积累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层面真正地迈出实质性一步,展现出一种全面综合的发展。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生产力发展,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量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共时性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仍然坚持传统社会主义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层面来对待资本主义,可能就不能真正地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可取经验,将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市场手段拿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发展层面真正达到量变积累的层次。因此,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社会形态角度共时性把握生产力发展的正确逻辑。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效果也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9]。而质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往往就不能看出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发展和完善,搞不清市场经济的本质。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身并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带来生产力的量变发展。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生产力发展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实现量变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该具体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立足具体的历史条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量变发展,是从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量变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促进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同样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推动量变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足生产关系部分质变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阶段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由量变引起部分质变是其阶段性发展必然展现出来的逻辑。具体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明确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主题,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要求我们准确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从整体上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是存在着区别的,这是“新时代”本质属性规定,这种区别不是简单的区别,而是带有一定质的规定性和复杂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生产关系发生部分质变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综合发展的历史阶段。

第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部分质变表现为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即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

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相比,显然更能准确地概括新时代客观形势的变化,美好生活需要既包括物质文化需要又高于物质文化需要。就是说,新时代的人民不仅需要物质文化,而且体现在精神、社会关系等方面,体现在生产关系方面,体现在人民是否可以共享发展的过程和成果。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量变发展,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人民在生产过程中的需要已不单单体现为物质文化,更体现为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分配产品了,而现实生产关系并不能实现这一功能,已发生与社会主义性质和原则不相符合的质变,人民已对它产生真正需要。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相比,也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发生部分的质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比落后的社会生产复杂,落后的社会生产往往主要体现在社会生产力上,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仅指落后的社会生产,还包括基于落后社会生产基础上的更高、更广的发展问题。不平衡不充分体现为发展问题,更体现为发展在生产关系、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等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中的关系问题。发展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中的平衡和充分,才是理解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完整要求。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部分质变表现为基于此开展的社会实践将十分艰巨与伟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自身的重要社会实践内容和目标,即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虽然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在经济、科技、国防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已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即使这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开展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社会实践活动解决生产关系部分质变的问题,因为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已体现为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客观前提。

就开展伟大斗争的对象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从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表现出来,即伟大斗争针对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消除体制机制的僵化、破除利益格局的固化、摆脱意识形态软化、

避免社会矛盾激化、防止生态环境恶化、清除政治生态腐化。”^[10]从范围和属性来看,这些问题显然已融入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之内,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不是单纯地呈现,而是能够体现在社会关系整体层面,甚至可以反映到生产力方面。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展伟大斗争是复杂和艰巨的,就因为它是包含着生产关系部分质变在内。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部分质变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扬革命精神进行社会革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不是量变,不是简单地数量积累,而是在内涵和外延方面发生的变化,是能够展现在社会层面上的变化,也是能够带来重大社会问题的变化。因此,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发扬革命精神进行社会革命。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因此,立足生产关系的部分质变谋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综合发展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发扬革命精神实现社会革命的重要目标,也是自我革命的现实要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是立足新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即生产关系部分质变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革命,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新时代仍然面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要矛盾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的优势,就必须不断地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

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生产关系完全质变的历史阶段,它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所以从本质上讲它的生产关系没有已经发展到完全质变的程度,仍然

属于与生产力非对抗性矛盾范畴内的生产关系,但它已经表现为影响和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切实有效的社会实践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综合地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赋予新时代的任务和使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秦宣. 全面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1):65-74.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9.
- [4] 侯树栋. 唯物史观的历史规律学说再思考[J]. 社会科学,2005(5):129-133.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84.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
- [7] 肖贵清.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J]. 求索,2018(1):12-22.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6.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
- [10] 尚庆飞.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展伟大斗争的认识与思考[J]. 国外理论动态,2017(11):5-7.

(责任编辑:许宇鹏)

(上接第27页)

参考文献:

- [1] 钱玄. 礼记(上)[M]. 长沙:岳麓书社,2001:296.
- [2] 孔丘. 论语全鉴·珍藏版[M]. 东篱子,解译.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242.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3-564.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827.
- [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卢现祥. 共享经济:交易成本最小化、制度变革与制度供给[J]. 社会科学战线,2016(9):51-61.
- [7] 乔洪武,张江城. 共享经济:经济伦理的一种新常态[J]. 天津社会科学,2016(3):93-98.
- [8] 李飞翔,谭舒. 共享经济现象背后的四维伦理反思及其启示[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35(1):21-27.
- [9] 苏剑. 共享经济:动因、问题和前景[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2):126-131.
- [10] 董成惠. 共享经济:理论与现实[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6,31(5):4-15.

(责任编辑:许宇鹏)